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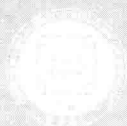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流沙墜簡》考論

蔡淵迪 著

中西書局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流沙墜簡》考論

蔡淵迪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流沙墜簡》考論 / 蔡淵迪著. —上海: 中西書局, 2017.12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

ISBN 978-7-5475-1352-1

I. ①流… II. ①蔡… III. ①簡(考古)—研究—中國
②帛書—研究—中國 IV. ①K877.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73995 號

《流沙墜簡》考論

蔡淵迪 著

責任編輯 田 穎

助理編輯 黃一村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陝西北路 457 號(200040)

印 刷 上海肖華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張 16.5

字 數 228 000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1352-1 / K·254

定 價 58.00 元

本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T: 021-66012351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博士叢書》序

《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的第一輯即將陸續出版，劉釗教授和中西書局要我在這套叢書前寫幾句話。

這套博士叢書所收的大多是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方面的博士學位論文，是這些年輕學者們在學術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些博士論文經過十餘位專家審讀，最終入選叢書出版，至少說明它們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進作用。我也曾讀過第一輯的部分入選論文或其中的一些章節，感到就我讀過的部分而言，是比較扎實嚴謹、言之有物的，值得相關研究者參考。當然，這些著作肯定也存在不少問題和錯誤，希望讀者多予批評指教。

袁錫奎

2012年9月13日

序

淵迪的博士論文就要出版了，他請我給他的第一部著作寫序。作為老師，最高興的莫過於學生有成果出版發表，這個任務自然是樂於接受的。接受了任務，自然就要完成它，但寫點什麼呢？給學生的著作寫的序，主要就是兩點，一是回憶這些年師生交流的點滴，再是誇贊學生成果的優秀。我是靠孔子吃飯的，自然記得夫子的教誨：吾從衆。

淵迪 2006 年本科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由於他有書法方面的特長，畢業後到海寧市徐邦達藝術館工作，主要負責館內《心遠》雜誌的編輯。2008 年 9 月進入古籍所從我研學，攻讀碩士學位。經過半年多的學習，以敦煌經典書法（名家作品或是能進入名家譜系的書法作品）研究作為碩士論文選題。淵迪愛好書法與古典詩文，又經過四年法學薰陶，不僅有文學人的感悟，也具有法律人的思辨，加上學習又異常刻苦，幾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很快就寫出了優秀的論文。2009 年 5 月 31 日，他的第一篇論文《敦煌本〈筆勢論〉殘卷研究》的初稿就發到了我的電子郵箱。經過兩次修改，6 月 12 日定稿投寄《敦煌研究》，2010 年第 3 期就刊出了，這距他接觸敦煌學研究僅僅過了九個月時間。我於 2008 年起主持“敦煌子部文獻彙輯集校”項目，而淵迪正好長於書法藝術，於是把子部藝術類部分寫卷的整理工作交給了他，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的第一個副產品。

2010 年 5 月 1 日，淵迪完成了《敦煌經典書法寫卷與相關習字研究》的碩士論文，5 月 31 日通過答辯。這篇論文對敦煌經典書法作了集成性的研究，將其分為敦煌經典書法寫本、敦煌經典書法拓本、敦煌經典書法習字三類，並對每件作品作了詳盡的敘錄，對以後敦煌書法系統、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獲得了評審專家與答辯委員會的高度贊揚。接着《關於敦

煌本十七帖臨本的幾個問題》(提交 2010 年 5 月在杭州召開的百年敦煌學研究國際討論會)、《俄藏殘本索靖〈月儀帖〉之綴合及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2 卷, 2011 年)、《杏雨書屋藏敦煌舞譜卷校錄並研究》(《敦煌研究》2012 年第 1 期)等論文相繼發表在敦煌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刊物上。淵迪 2011 年獲得了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設立的“敦煌獎學金”一等獎, 並作為獲獎學生代表上臺領獎。

2010 年 5 月, 淵迪以高分考取古籍所博士生, 跟隨我繼續研習敦煌學。淵迪偏好文史之學, 而不甚喜傳統小學, 故提出以“中國早期敦煌學史論”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很快, 淵迪的早期敦煌學史研究的第一篇論文《伯編敦煌文獻目錄羅譯本考》得到國際著名敦煌學家京都大學高田時雄教授的首肯, 發表在他主編的《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6 號(2012 年 3 月)上。伯希和編有《伯希和敦煌收集品目錄》(*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Fonds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2001-3511, 4500-4521), 用法文撰就, 有羅福萇和陸翔的兩個中譯本。羅譯本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譯出, 而陸譯本則在三十年代譯出, 羅譯本簡略而陸譯本詳備, 故在中國學界, 通行陸譯本, 而羅譯本則很少被人關注。該文考定羅譯本所依據的伯希和目錄並非伯希和的法文原本, 而是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於 1912 年抄譯的日文本, 但伯希和的編目工作直到 1920 年才結束, 伯希和對此草目應該會有一些修訂。而陸譯本是留學法國的張鳳於 1922 年至 1924 年間從法文原目抄回交給陸翔翻譯的, 這就是陸譯本詳備而羅譯本簡略的主要原因。接着論文對羅譯本與陸譯本作了詳細的對勘, 發現有不少地方可以用羅譯本補正陸譯本, 說明羅譯本雖然簡略且編號又少於陸譯本, 但在伯希和草目原本沒有正式出版的今天, 羅譯本仍不可偏廢。該文提醒我們, 在對敦煌寫卷的編號、定名進行學術史回顧時, 不能回避羅譯本, 否則就不能很好地抉發敦煌學史上第一部法藏文獻的目錄——伯希和草目的學術價值。該文條分縷析, 細心爬梳, 考訂精詳, 邏輯嚴密, 環環相扣, 解決了早期敦煌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淵迪具有廣闊的學術視野, 將早期敦煌學史置於近現代學術史乃至整

個中國學術史的範疇內綜合考慮，而且又有優秀的前期成果發表，其學位論文獲得了學校的優秀博士學位論文資助。我當時在申請書上的“指導教師意見”一欄是這樣表述的：

蔡淵迪讀書細心而求甚解，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他在撰寫碩士論文時，就已經敏銳地感覺到早期敦煌學史中存在的諸多未解問題，當時他就與我探討過他的想法。我鼓勵他繼續就此問題進行思考，因而他把博士期間的課題確定為早期敦煌學史的研究。進入博士階段學習後，蔡君閱讀了大量民國時期的著作、日記，並把民國學術情況放在當時整個國際學術背景下進行觀照，有了比較成熟的想法。這是一個金點子，一個了不起的想法。蔡君的課題，不僅具有國際視野，而且具有歷史觀念，中外數萬里，上下數百年，相關資料汗牛充棟，而收集資料又艱辛異常。該課題不僅需要宏觀的視野，還需有細緻的考據，可以說是宏觀與微觀的統一呈現，思辨與考據的有機結合。

2014年上半年，淵迪獲得“浙江大學研究生對外交流項目”的資助，前往臺灣大學訪學。臺灣大學豐富的藏書，給淵迪的學術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臺灣學者的研究方法與國際視野，也給淵迪很多啟發。從臺灣回來後，他陸續寫出了《〈流沙墜簡〉引用金石文獻考》、《羅振玉信札中的敦煌學史料》、《布新傳古——〈雪堂校刊群書叙錄〉所見羅振玉的學術自覺》、《〈伯目〉兩種中譯合論》等論文。2015年3月20日，他完成了博士論文《〈流沙墜簡〉考論》。因當時我正好去山東大學參加“儒學文獻整理研究高端論壇”，直到23日晚上才回杭，所以留給我看論文的時間只有兩天了。兩天時間裏，我仔細閱讀了全文，除了一些表述和格式的問題，對論文內容基本提不出什麼意見。一方面應該是由於我對這一問題平時沒有什麼關注，所知不多，但主要還是文章的質量高，這從以後諸位評審專家的評語可知。論文評審的五位專家一致認為這是一篇非常優秀的博士論文，給予了全優的評定。

《流沙墜簡》是羅振玉、王國維合著的關於西北出土簡牘研究的代表性

成果，是中國簡牘學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在簡牘學史、近代學術史領域占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前賢對此書的內容及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已有諸多論述。淵迪的論文別出機杼，將《流沙墜簡》一書置於近代學術史背景下探討它在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化轉型中的重要作用，選題具有前沿性、獨創性。

因為這是專門研究《流沙墜簡》的論文，所以釐清該書的版本問題是研究其他問題的基石。《流沙墜簡》有 1914 年初版本、1934 年修訂再版本，但這個再版本是王國維自沉七年以後出版的，並非王國維親自修訂，所以存在很多問題，但卻鮮有人注意並提及。論文將再版本與初版本以及《流沙墜簡補遺考釋》、《觀堂集林》詳細比勘，證實再版本非王國維手訂，而是後人將王國維在《流沙墜簡》初版本上作的批注不加裁翦、不加潤色地插入《流沙墜簡》考釋的正文而成的，故常有鑿枘不通之處。文章不僅疏通了《流沙墜簡》一書的文本演變脈絡，而且指出了初版與再版本各自的優劣，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五章“版本考”、第六章“修訂考”兩章的篇幅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強，是全文的重心所在，資料翔實，立論清晰，邏輯嚴密，考證精細，顯示出淵迪具有古代史方面的良好基礎與扎實的文獻學功底。

總體上來看，該文在以下幾方面具有創新性：

一、論證《流沙墜簡》是近代國學的先驅。

二、《流沙墜簡》在王國維本人學術生涯中產生的重要意義。

三、對《流沙墜簡》成書史料及各版本間關係的考訂，從文獻學角度釐清了此書的版本源流、史料來源、文本校勘、學術影響諸方面問題。

四、通過對羅王往來書信及《屯戍叢殘考釋》中相關內容的考察，證明羅振玉對王國維的學術具有重大影響，糾正了過去學界存在的偏見。

《〈流沙墜簡〉考論》一文獲得了 2016 年浙江大學第三屆學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現在又被選入《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博士叢書》，將在中西書局出版，說明淵迪的成果獲得了學術界的肯定。《〈流沙墜簡〉考論》所研究的僅僅是一本書，只是淵迪早期敦煌學史論研究方向中的一隻麟角而已，可見這個研究領域是一座蘊藏着無窮資源的富礦，就待有識

之士前往開發了。

我們每一個人來世上作客一遭，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沒有一絲一毫的必然性。既然如此，總得給招待你吃喝的地球主人送點禮物，才不負做客之道。作為讀書人，最好的禮物自然是著書立說。雖然吾等中人之才，寫不出留傳萬古的著作，立不了輝耀千載的學說，但竭己所能，作幾篇言之有物的文章，寫兩部有一孔之見的著作，還是可以努力的。外面的世界紛紛擾擾，熙熙攘攘，總是有一些事物影響我們的心緒，牽扯我們的精力。希望淵迪能儘量不為外物所擾，發揮自己的才智，在這個領域繼續深挖，寫出更多更精彩的好書。

許建平

2017年12月於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流沙墜簡》概述	1
第二節 歷來有關《流沙墜簡》之研究情況	7
第三節 本書之研究特點——學術史與文獻學的視角	12
第四節 本書研究對象之特性及其影響	15
第五節 本書引文凡例及常用文獻之縮略語	17
第二章 《流沙墜簡》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意義及其命運	22
第一節 《墜簡》之近代性	24
第二節 《墜簡》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之命運	37
第三節 小結	45
第三章 《流沙墜簡》在王國維個人學術生涯中之意義	47
第一節 王國維本人眼中之《墜簡》	47
第二節 初出茅廬第一功	50
第三節 《墜簡》的反響	61
第四節 小結	65
第四章 《流沙墜簡》成書史料考證	67
第一節 羅振玉獲知斯坦因掘得西北簡牘的渠道	68
第二節 羅振玉收到沙畹所寄書並開始研究簡牘之時間	74
第三節 羅王二人次第撰成考釋時間之旁證	76

第四節 《墜簡》謄寫、印刷之經過	79
第五節 小結	84
第五章 《流沙墜簡》版本考	86
第一節 引論	86
第二節 再版《墜簡》雜湊之迹	89
第三節 再版《墜簡》批注散入正文之痕迹	105
第四節 《集林》收入之《墜簡》條目校正	112
第五節 再版《墜簡》校讀札記	123
第六節 小結	130
第六章 《流沙墜簡》修訂考	142
第一節 《墜簡》考釋對於圖版部分的修訂	143
第二節 王國維讀斯坦因“紀行之書”後對《墜簡》的修訂	146
第三節 自《墜簡》初版問世後至丙辰《沙補》間的修訂	149
第四節 丙辰《沙補》刊出以後王氏對於《墜簡》之修訂	153
第五節 《觀堂集林》刊出以後之修訂及其他	158
第六節 小結	159
第七章 《流沙墜簡》引用金石文獻考	161
第一節 概論	161
第二節 學術風格淵源	164
第三節 《墜簡》引用金石文獻之問題	168
第四節 小結	177
附表：《墜簡》引用金石文獻表	178
第八章 《屯戍叢殘考釋》中之羅振玉影響	182
第一節 引論	182

第二節 《屯戍叢殘考釋》中羅振玉的具體影響	183
第三節 小結	197
第九章 《流沙墜簡》商補五則	199
附 錄 布新傳古	
——《雪堂校刊群書叙錄》所見羅振玉的學術自覺	212
參考文獻	234
後記	243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流沙墜簡》概述

由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合著的《流沙墜簡》(以下簡稱“《墜簡》”)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這一點應該沒有人不同意。至於它究竟重要到怎樣的程度,本書第二、三章有專門的探討。此處僅列舉其再版情況,以見其書之重要。《墜簡》初版於1914年,二十年後,即1934年,修訂再版。此後,修訂之再版本又多次被影印出版。所見再版《墜簡》之影印本有如下三種:1. 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9年7月影印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第7冊),2. 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10月影印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7輯,第180冊),3. 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9月影印單行本。是為全本影印者。其中羅振玉分撰部分又有兩種影印本:一見於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12月影印之《羅雪堂合集》(第11函),一見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之《羅振玉學術論著集》(第2集),此二種影印本皆僅有考釋文字而無對應簡牘圖片。除影印本之外,《墜簡》又有兩種整理本:一為方詩銘點校、李解民復校的版本,收入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之《王國維全集》第4卷,僅王國維分撰部分,簡牘圖片與考釋俱全,並將王氏《流沙墜簡考釋補正》收錄(以下於此本多引稱為“方詩銘整理本”);一為何立民標點整理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是本乃迄今為止唯一一個《墜簡》的全本整理本,與方詩銘整理本一樣,也將《流沙墜簡考釋補正》整理收入(以下於此本多引稱為“何立民整理本”)。一部一百年前的學術著作,在一百年間出現了這麼多的版本,一百年後又還有重版的價值,足以說明它

的重要性了。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完全值得我們用不同的視角對它認真審視一番。

關於此書之緣起，講的人也很多了，作為必要的背景介紹，此處僅撮其大要於下。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分別於1900—1901年和1906—1908年先後兩次到中亞進行考古發掘。第一次在新疆的和田與尼雅，第二次又在新疆的羅布淖爾、甘肅的敦煌發掘到大量簡、紙文獻。^①其中既有漢文，又有很多中亞胡語文獻(有梵文、佉盧文、于闐文等)，而以漢文文獻最為大宗。斯坦因將這些漢文文獻交由當時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整理。沙畹對於和田、尼雅出土漢文文獻的整理成果是《丹丹烏里克、尼雅及安迪爾出土的漢文文獻》(*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ān-Uiliq, Niya and Endere*)，收附在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報告《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第521—547頁)一書中。沙氏對於樓蘭、敦煌漢文簡紙文獻的整理成果則是《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所獲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其中亦有少量和田、尼雅簡)。前者出版於1907年，後者出版於1913年。^②就在後者整理完畢、即將刊布之際，應羅振玉的請求，沙畹將該書的待刊校樣寄給了羅氏。

羅振玉大約在癸丑(1913)十二月才收到沙氏所寄書。很快，他便和王國維一起開始從事整理研究了。沙氏原書既有簡牘圖片，又有與之相對應的釋文；個別地方則僅有錄文而無原簡圖片。羅、王二人主要是對其中的圖

① 在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斯坦因還從王道士手中購得大量敦煌藏經洞寫卷。不過，這與斯坦因在此次考察中通過考古發掘而得到的簡、紙文獻要區別開來。

② 有關斯坦因三次中亞考察的簡介參榮新江：《于闐、龜茲、樓蘭、高昌寶藏的爭奪》，收入氏著《敦煌學十八講》，第132—13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片部分予以重新研究，僅有沙氏錄文而無對應圖片的，則用作參考。^①沙氏原書除了《急就篇》殘簡外，其餘大多按簡牘出土地點分類。羅、王則將圖片上所見的五百餘枚簡牘（少量帛、紙文書）全部按照內容重新進行分類。先將各簡分作書籍、書信和簿籍叢殘三大類。書籍部分因其“僅得《蒼頡》、《急就》、《力牧》、曆譜、算術、陰陽書、占書、相馬經、獸醫方而已……不出《班志》小學、術數、方技三類中”，^②故題為“小學術數方技書”，其中部類次序也一依《漢書·藝文志》（即上引文中的《班志》）。書信部分則用“簡牘遺文”這一比較古雅的名稱。其餘殘簡“率紀塞上屯戍之事”，^③是名之為“屯戍叢殘”。羅振玉將這部分殘簡交由王國維考釋，書籍和書信兩部分則由自己考釋。

任務分配既定，羅、王二人便分頭從事研究，僅僅一個月的工夫，便“條理粗具”了。^④《屯戍叢殘》部分，王氏復將其分作“簿書”、“烽燧”、“戍役”、“稟給”、“器物”和“雜事”六類。至此，《墜簡》一書之部類完全確定。由於日本和上海“求之甚亟”，羅振玉乃將已經重新排類的簡牘圖片先期印出發行。此時為甲寅二月中旬，^⑤上距羅氏收到沙畹所寄校樣僅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所有簡牘圖片全部採用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影印技術——珂羅版，按原簡尺寸原大精印。是以印出的簡牘非常清晰，圖片極為精美。羅振玉自己都感嘆其書“竟與法人原書無二”，特別還在此下注了“幾過之”三個字，^⑥也就是說以印刷質量而言，甚至比沙畹原書還要勝出一籌。筆者曾見過不止一本初版的《墜簡》，其圖片之精美確實令人嘆為觀止。當時的珂羅版印刷技術雖然在色彩方面還只能印作黑白，但這種印刷技術在圖像層次

① 《流沙墜簡》中釋文條目采錄了沙畹的錄文而無圖片對應的，僅有《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中的《力牧》第2簡。至於羅、王在考證中用到僅有沙氏釋文而未見簡牘圖片的地方則所在多有，如烽燧類第1—6簡考釋中引道：“沙氏書中所錄釋文有玉門候官語（原注：沙書第四百四十八簡，原簡未印）。”

② 羅振玉：《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序》，《流沙墜簡》，第75頁，中華書局1993年。

③ 王國維：《屯戍叢殘考釋序》，《流沙墜簡》，第101頁。

④ 王國維：《流沙墜簡序》，《流沙墜簡》，第3頁。

⑤ 參羅振玉甲寅二月十六日致寶熙函，詳見本書第四章《〈流沙墜簡〉成書史料考證》。

⑥ 王慶祥等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第37號，東方出版社2000年。

感的表現方面至今仍有其無可替代的優越性。而且，以這種技術進行印刷的整個過程中，色彩、層次和對比度皆可通過修板而人為調控，是以印出來的圖片比原物更為清晰可讀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說，僅就文字的可識別性而言，經羅振玉印出的簡牘不僅未必會“下真迹一等”，反而可能會高出真迹一籌。此外，最為重要的是，這些簡牘皆按照原尺寸印刷，更是難能可貴。當然，如此精美的印刷，其印刷成本相應地也會很高。羅氏在與友人的書信中屢次感嘆珂羅版印刷價格之高，但為了使各種重要文物得到廣泛而又精確的刊布，又非仰賴於這種價格高昂的技術不可，是以羅氏每每發出無可奈何的浩嘆。而印刷成本既如是之高，書成之後的定價自然也就水漲船高，這又一定會影響到該書的傳播與接受；並且，由於印刷成本過高，一旦排定圖片，也就不會輕易重版，即使發現了其中排類上有錯誤，也往往只能采取變通辦法，這就對《墜簡》的修訂工作產生了種種影響。這兩方面的問題，本書在第二章《〈流沙墜簡〉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意義及其命運》與第五章《〈流沙墜簡〉版本考》中皆有詳論，茲不贅述。

當《墜簡》圖片冊全部印出並先期發行之際，羅、王二人的考釋工作也已接近尾聲。半個月後，王國維已將《小學術數方技書考釋》與《屯戍叢殘考釋》全部謄寫完畢。《流沙墜簡》的主體部分基本定稿。至遲在甲寅（1914）陰曆三月末，《墜簡》的考釋部分亦已印成。^①

就在王國維謄寫《墜簡》考釋時，他又“得讀斯坦因紀行之書”。這部“紀行之書”王氏未說明具體書名，以後來王氏對於《墜簡》所作的修訂和補充來看，至少有兩種。一為上文所提到的《古代和闐》（王氏譯《古于闐廢址考》^②），此書

① 參羅振玉甲寅三月廿九日致沈曾植函，詳見本書第四章《〈流沙墜簡〉成書史料考證》。

② 斯坦因於第一次中亞考察著書有二：一即上文所提到的《古代和闐》，正如其副標題“detailed report”所示，乃是正式的考古報告，十分詳盡；另一種題稱《沙埋和闐廢址記》（*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是其個人旅行記。王國維所譯《古于闐廢址考》的名稱與後者相似，但考王氏所用內容，知必是前者。《沙埋和闐廢址記》中未載有漢文簡牘之圖版。日後王國維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演講，謂斯坦因“第一次所得，印於斯氏《和闐故迹》（*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靜安文集續編》，第67A頁，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商務印書館1940年本），必是誤記。

印了部分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時在和田、尼雅掘得的簡牘，王氏遂對這些印出的簡牘重新作了排類並考釋，成《流沙墜簡補遺》並《考釋》兩種。第二當是斯坦因記錄他第二次中亞考察的著作。^① 在這部著作中王氏看到了斯坦因所繪的敦煌古長城、烽燧遺址地圖，並且知悉了《墜簡》中各簡的具體出土地點，這些對於簡牘的考釋來說當然是極為重要的信息，也必然會引起王氏對於原先考釋的修改。但由於原來的考釋謄寫已經過半，王氏乃將需要修訂的地方彙總於書末，是為《屯戍叢殘考釋跋》和《烽燧圖表》。

除此之外，王氏復對日本大谷探險隊在羅布淖爾附近所獲李柏文書做了考釋，作為《墜簡》的附錄。因為大谷探險隊所獲的這宗李柏文書與斯坦因在羅布淖爾北所獲簡紙文獻關係十分密切，而王氏在《流沙墜簡序》中已經利用到這宗文書了。

當這些補遺、圖表和附錄完成之後，初版《墜簡》全部告竣。王氏《烽燧圖表跋》署“甲寅四月七日”，這是《墜簡》一書中所見最晚的時間，大概也就是初版《墜簡》徹底完成之日吧。至於這些補遺、附錄之類的文字最終何時印成，以羅振玉處事之勇且銳，想來不會超過一月。

正由於《墜簡》的整個“生產”過程階段分明，使得“流沙墜簡”這個名稱有了狹義、中義、廣義的指稱。最為狹義的《流沙墜簡》僅指《墜簡》的圖片冊，前有羅、王二序，如此而已。比《墜簡》成書稍早的羅、王另一部著作——《齊魯封泥集存》，亦僅兩篇序文加上排好次序的圖片。羅振玉的“傳古”熱情遠比“考古”興趣大（參本書附錄《布新傳古》部分）。推測其出版《墜簡》的本意，主要還是傳布這些簡牘圖片。

中義的《流沙墜簡》包括圖片部分和對應考釋即《流沙墜簡考釋》三卷，但没有《流沙墜簡補遺》以下的內容，一般分訂為兩冊。筆者曾見過傅斯年

① 與第一次中亞考察一樣，斯坦因對第二次中亞考察活動的記錄亦有二：一為《沙埋契丹廢址記》(*Sand-buried Ruins of Cathay*)，是為斯坦因個人旅行記；一為《塞林提亞——在中亞和中國西陲考察的詳細報告》(*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前一種 1912 年出版，後一種遲至 1921 年才出版。王國維當時所見者必為前一種無疑。